

台灣選舉的文化與傳播

馬成龍*

壹、外人不解的政治現象

數年前由美返台參加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期間，一位世新大學老師開車載我及另外兩位外地來的傳播學者到木柵看看。駕駛路況不熟，中途迷路，由我下車走到路旁民宅問路，得到的答案竟然是：「你吃台灣米，喝台灣水，為何不說台灣話？」我當時楞住了，告訴我不住台灣，所以不吃台灣米，也不喝台灣水，然後轉身就走。回到車上，不知該如何向兩位沒有台灣背景的朋友描述剛才發生的事情。但我自己不停地思索，如果我在另一個國家問路，例如在孟加拉、菲律賓、或伊拉克向陌生人問路，會不會得到同樣的答案？會不會有人在我問路時，對我說我吃孟加拉米，喝孟加拉水，為何不說孟加拉話？

這次總統大選一週前，一位住美國德州的朋友在電話中明確告訴我這次不會回台投票。可是三天後，他突然告訴我他和太太都要立刻動身返台，因為別人要他回去投票。後來才知北美有一、二十萬人都在選前最後幾天匆促決定回台投票。這位朋友每次與我見面時都大罵他上次支持的候選人，但這次他還是將票投給了同一個人。

三月十八日回台北後，聽說家人常去的教會的牧師回屏東老家時，接受了某黨贈送的一個便當，很多收到便當的人不知道便當底部躺著一千元現鈔，用完餐後就將空盒子扔掉，後來知道了後悔不已。我聽後才知道原來賄選並沒有在台灣絕跡，而且改革口號與賄選可以不抵觸。

*香港浸會大學傳播系副教授。E-mail: ringoma@hkbu.edu.hk

台灣以外的華人問我為何很多台灣政黨的黨主席任期滿了之後都會離開該黨，而且變成該黨的敵人。我不知如何回答。

選後香港一家媒體記者在電視節目描述他在台灣南部採訪選戰時的遭遇，說當地民眾聽到他們是香港來的，立刻對他們惡言相向，並說他們是「共匪」，不歡迎他們採訪。

香港媒體對這次台灣大選有很廣泛與深入的報導，而在香港社會，台灣大選也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我的香港學生並以台灣大選作為他們小組作業 (group project) 的題目，並在報告結束時高舉雙手大喊「凍蒜」！看看他們的酷像，再想想扁帽與阿扁娃娃在台灣暢銷，我頓時悟出原來台灣政治人物已讓選舉及候選人成為流行文化 (popular culture) 的一部份。

貳、民族主義戰勝了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

三月二十一日晚由中正機場搭機返港，從台灣帶回來一大堆困惑，記得以前看偉大愛情片，有人問：為何要「愛得那麼痛苦」或「愛的死去活來」？我現在不禁要問：為何要「選得那麼痛苦」或「選得死去活來」？

臺灣民主的機制是建立了，但離民主的實質還很遠。比方說，2000年的選舉，大家都知道在選舉的末期，李登輝暗中幫助陳水扁，因為當時連戰大勢已去，他不希望看到宋楚瑜當選，所以偷偷地幫助陳水扁。這是完全違反民主常規的，一個執政黨主席怎麼可以去幫助一個最大反對黨的候選人？這怎能叫政黨輪替？應該叫「堯舜禪讓」才對。政黨輪替的受惠者應該是庶民百姓，因為可以經由輪替將舊政權的腐敗作徹底的揭發。而台灣所謂的第一次政黨輪替則正好相反，新政權與舊政權互相掩護，使重大弊案無法水落石出，百姓反而成了受害者。

每到選舉就有人高喊外來政權滾回去，把選戰拉高到民族生死存亡

大戰，使本土認同的議題高於其他議題。本來，民主是一個反腐的自然機制，你做得不好，就下臺，換一個人。上臺的人會把前面一個人的毛病揪出來，或者像南韓全斗煥被送進大牢關起來。可是如果別的議題都不重要，只談民族認同的話，反而會讓民主成了腐化的保護傘。怎麼腐化都沒有關係了，都不重要了，只要你選我，就代表認同臺灣，你不選我就代表不認同臺灣。把本土認同拿來當選戰的主軸，有點像是一個不會做菜的廚子，只會猛撒味精。因為這是一種最快最廉價的調味料。如果用骨頭熬湯的話，要很久才能熬出一鍋湯來。可是撒一大把味精，味道立刻就出來了。喝這種湯喝多了難免不出毛病。

多數台灣人不接受中國大陸提議的一國兩制，但卻很少人想過「兩國一制」的問題。如果全世界都承認中國與台灣是一邊一國，但台灣的制度卻愈來愈像中國，不知是否仍然可以接受？台灣政治人物用「相信台灣」的口號贏得選票，就像中國領導人用「偉大祖國」凝聚人心，兩者都成功地移轉了人民對施政不佳的注意力。台灣極端份子說的「不愛台灣就滾回中國去」比中共保守人士說的「只有愛國者才能治港」還要兇狠，因為前者意謂著要剝奪居住權，而後者則只想剝奪參政權。台灣政府用選擇辦案，選擇查稅來達成消除雜音的目的，也與最近廣州市政府對付《南方都市報》副總編程益中的手法類似，都是用表面合法的手段，製造寒蟬效應。此外，在台灣大多數的外省第三代不但和二二八沒有任何關聯，家中成員也不曾從蔣家政權得到任何好處，但他們卻要「滾回中國去」，這和毛澤東控制下的中國大陸將無辜的人根據家庭「成份」打成黑五類有何不同？

參、台灣選舉的文化與傳播

我現在來談談這些選舉現象背後的文化與傳播。文化與傳播是我的主要研究興趣。我在美國時發表過不少與中華文化與傳播有關的論文，

這幾年，因為人在香港，更有機會仔細觀察台灣社會的變化，也慢慢產生了一些新的思考。

台灣社會有一股很大的「去中國化」浪潮，同時也有一股很強的哈日風（包括李登輝那批老哈日與年輕的小哈日族群）。但事實上，台灣老早已「去中國化」，而且不只是台灣，中港台三地都早已「去中國化」了，日本才是將中華文化保存得最好的地方，所以真正哈日的結果應該是再度中國化。此話怎說？在中港台住過又到過日本的人都強烈地感受到，「禮義廉恥」早就不存在於中港台，但仍在日本社會被維護得很好。在台灣很多中小學還可看到一幅木製的「禮義廉恥」橫額，這是由於很多年前蔣中正鑒於「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而將「禮義廉恥」訂為共同校訓。可是今日的台灣社會，尤其是選舉期間，能見到多少「禮義廉恥」？再說一例，如果有空到日本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的網頁去看看他的人生「信念」，你會很驚訝地發現他的座右銘有四分之三都與論語有關，其中最重要的是「民無信不立」。所以如果真的要「去中國化」，最好不要哈日，因為兜了一圈，最後可能還是回到原點，反倒是如果要加深中國化，日本可能是個最值得學習的地方。在傳播界也可以看到許多介紹美好中華文化與傳播的文章，但其實那都是在談日本傳播，而非中華傳播或台灣傳播，當然更不是台灣選舉傳播。

我在北美教了十五年傳播學（加拿大四年，美國十一年），如果加上研究生時代的獨立教課，則接近二十年。教過的科目包括人際溝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溝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組織溝通（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勸說（Persuasion），語言與溝通（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傳播理論（Communication Theory），傳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等。看看台灣社會，再想想我用過的教科書，我想要不是這些教科書太天真浪漫，就是台灣社會提供了太多的負面實例。

例如，我們教學生不可以自我族群為中心（ethnocentric），或是要從

別人的角度看事情(perspective taking)，但在台灣聽到的是：「台北是外來政權的大本營」以及「中國豬滾回去」。如果北台灣的人也說：「南台灣人滾回去」，上海人跟著說：「台灣豬滾回去」，那看來只有發動一場族群相互滅絕的戰爭(genocide)才能解決問題了。

當不同族群互動時，如果其中一個族群不停的受到另一個族群的惡言相向，那麼原本沒有敵意的這個族群便會修正他們對對方的看法，並對對方的敵意變得非常敏感。在跨文化溝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課本上，這叫做“sensitized perception”。我對這個現象的感受很深。記得在 1980 年代，我認識有不少外省朋友都同情黨外，他們即使沒有參加黨外的抗爭活動，言談中卻肯定黨外人士的努力，但這些人後來反而去支持他們當初討厭的國民黨。為什麼？很簡單，因為民進黨的候選人在不同場合說出：「中國豬滾回去」。有一位朋友在野外郊遊時，和同行的朋友批評李登輝的施政，前面一名陌生男子居然回頭對他們說：「你們滾回中國去！」這樣的敵意能不挑起他們對對方的敵意嗎？原來討厭蔣家的外省人不在少數，他們以為民進黨的改革會帶來一個美好的未來，但現在對方先排斥他們，還叫這些台灣出生的人「滾回中國去」。他們怎會不被 sensitized？美國的台灣移民，或是上海的台商，即使再惹人討厭，也沒有人叫他們滾回去。

我教人際衝突的時候，會提到正面和反面的人際衝突模式，其中有一項是「整合」相對於「極化」(Integration versus Polarization)，「整合」是指異中求同，找出雙方的交集，而「極化」則是同中求異，刻意要找出原因醜化對方，美化己方。台灣選舉毫無疑問是屬於後者。而日益嚴重的極化現象完全是政治人物造成的，尤其是政績不佳的政治人物，全靠極化，獲得支持。

古典的勸說(persuasion)理論認為「信仰改變→態度改變→行為改變」是勸說的三部曲。例如，我要提一個施政計劃，先讓聽眾相信這計劃對社區有益，這樣就會對這計劃持正面肯定的看法，然後才會以行動支持我的計劃。但當此模式應用到複雜的人際關係就有問題了，因為

多出了許多非理性因素，例如關係壓力（「我如果支持他，我女朋友會和我翻臉」），所以後來有了所謂 *compliance gaining* 的研究，就是專門研究未先經信仰態度改變的行為改變。另外一個廣為人知的勸說理論，*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 告訴我們只有選擇「中間路徑」(central route) 的勸說對象會針對議題進行思考，而選擇「邊緣路徑」(peripheral route) 的勸說對象則是進行與議題無關的思考，例如：「如果某黨落選，我爸公司會遭殃，所以我要投給這個我不喜歡的黨」。台灣選舉很明顯充斥著 *compliance gaining* 的關係壓力與行走「邊緣路徑」的人。這本無可厚非，但如果比例偏高，就形成了潛在的社會危機，因為意謂著政治人物不太需要為施政負責，至少，他們的 *accountability* 不成為一項重要因素。然而所以會形成這種現象則又與族群分化有關。一般而言，我們對不同議題有不同程度的關心，而且像 *Abraham Maslow* 的需求階層(Hierarchy of Needs)觀念裡描述的人類需求是有先後之別的：連水和空氣都沒有的時候，人權當然不重要。政治人物操弄族群就是要用族群問題掩埋其它議題，因為當一個人覺得「外來政權要復辟了」，或是「他們又在欺負我們台灣人了」，其它社會、經濟、法律問題都變成其次了。

台灣候選人喜歡稱選民為「鄉親」，而不是「公民」。Kenneth Burke 將 *rhetoric* 的核心從亞里斯多德的說服 (*persuasion*) 轉向認同 (*identification*)。他認為我們演講時藉著興趣的認同來拉近與聽眾的關係，也藉著使對方認同我們的興趣而達成勸說。人與人都有很大的不同，而認同是對這種分歧所作的補償，所以在傳播過程中促成認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與人之間沒有很大的差異，就沒有必要刻意促成這種結合。「鄉親」一詞自然是用來強調本土認同的選舉語言，它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只為了拉攏感情。但是它在台灣社會造成的潛在負面心理影響可能是將選舉降格為人際關係的運籌帷幄，而淡化其公民行為的本質。台灣實行全民直選總統之後，主政者李登輝、陳水扁其實可以很容易地將台灣帶向現代化的公民社會，亦即在國家的層次，不問背景，即

使你是菲律賓裔的歸化公民，只要你是公民，就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不容許任何特權或歧視。但他們沒有這樣做，依然用民粹的手法來贏取支持。

我們當然也可以從大眾傳播的角度來看台灣的選舉文化。在我住過及到過的國家，電視主要頻道幾乎都在晚間新聞之後播出娛樂節目，對多數人而言，忙碌了一天，也該輕鬆一下了。但是在台灣，最刺激緊張的時刻這才開始。各種政治性談話節目，一個接一個，緊抓著千萬人的心弦。許多人邊看邊罵，在仇恨嘆氣中度過了漫長的一晚。這種現象讓我覺得某些大傳理論在台灣有修正的必要。例如，教科書上說媒體的功能可分為監督（surveillance）、評論（correlation）、文化傳承（cultural transmission）、娛樂（entertainment）、及動員（mobilization）。但這些政治性談話節目是集所有功能於一身的「五合一」媒體製作。再從效果來談，如果說性與暴力的電影能影響觀眾的行為，那麼這些政治性談話節目能影響的不只是個人的暴力傾向，還是整個社會的暴戾之氣，不只是個人的健康問題，還是全民健保預算的重新編列。

肆、對未來的期待

但願以上所說的傳播現象只是過渡時期的特殊現象。執政黨再次贏得選舉後，希望陳水扁總統團隊能具備恢宏的國際視野，將多元文化、族群融合、反對歧視等普世價值做為重要施政理念。也能向日本小泉首相看齊，把中國儒家思想中的「民無信不立」當做座右銘。此外，我也希望臺灣永遠都有一個強大健全的反對黨。因為存在著一個能充分發揮制衡力量的反對黨乃是人民之福。

冀望台灣學術界能夠維持客觀中立。適時對當權者提出意見（例如揭露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並抱著捨我其誰之態度。以前不做國民黨的御用學者，現在也拒絕替民進黨學術大拜拜背書。我希望傳播學者，能

不畏艱難地，以傳教士的精神，告訴學生什麼是人類傳播行為的較佳選擇，而不是一群只期望有朝一日能「學而優則仕」的名利追求者。



智慧藏